

儒道

RU DAO YANJIU

研究

第四辑

卢国龙 /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儒道研究

第四辑

卢国龙 / 主编

赵法生 / 执行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儒道研究. 第四辑 / 卢国龙主编.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8

ISBN 978 - 7 - 5201 - 1302 - 1

I. ①儒… II. ①卢… III. ①儒家 - 研究②道家 - 研究 IV. ①B222.05②B223.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12279 号

儒道研究 (第四辑)

主 编 / 卢国龙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宋月华 范 迎

责任编辑 / 范 迎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人文分社(010)59367215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7 字 数: 263 千字

版 次 /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201 - 1302 - 1

定 价 / 6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出版得到了
西安都城隍庙和西安临潼明圣宫的资助

本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儒教研究中心

编

目 录

儒教信仰

“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

——论董仲舒的大一统学说 张宏斌 / 3

汉家祭祀的建立 李晓璇 / 33

苏洵的策论文风之刍议 古屿鑫 / 59

道家与道教

道教三十六天说溯源 王皓月 / 73

陶弘景的养生术

——从黄赤之道向偶景之术的转变 李勇强 / 90

儒学研究

走向近代的民主主义

——贺麟政治哲学思想简论 蔡志栋 / 115

“乡饮酒礼”与中国古代的养老制度 李冠云 / 128

爱人与克己

——略说仁道的两端 董卫国 / 145

朱子《论语集注》的格物体用论 张二平 / 156

传统社会中的自治

——以无锡华氏义庄为中心 袁灿兴 / 172

儒家信息观试说 闫恒 / 189

王符《潜夫论》的思想特色 宋洪兵 / 209

域外之声

以《周易》来看儒家的善恶思想 林在圭 / 235

道教超个人心理学

——定义、过往研究和未来朝向

(选译) Christopher Cott、Adam Rock 杨莉译 / 251

儒教信仰

“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

——论董仲舒的大一统学说

张宏斌*

七国之乱平息，天下秩序恢复到一统，“宽”“静”“无为”的黄老政策依然作为国家治理的主流思想，“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①。但是祸乱促使人们开始思索这种政策的可持续性以及合理性，早前贾谊言道：“今也平居，则无蒞施，不敬而素宽，有故必困。然而献计者类曰：‘无动为大耳。’夫‘无动’而可以振天下之败者，何等也？曰‘为大’，治，可也；若‘为大’，乱，岂若其小？悲夫！俗至不敬也，至无等也，至冒其上也，进计者犹曰‘无为’，可为长大息者此也。”^②几十年间，由于上位者的偏好，黄老无为的政策得以保持。然而形势比人强，顺应时代，满足国家、社会、民众所需的思想终究要破茧而出。

西汉初立国几十年间，尽管矛盾不断，但国库充盈，家给人足，“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廩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

* 张宏斌，河南沈丘人，哲学博士，宗教学博士后，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儒教室。

① 《史记·外戚世家》。

② 《新书·孽产子》。

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①。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夫子亦言“庶之”“富之”“教之”,“世而后仁”,礼乐之兴正当时也。

及高皇帝诛项籍,举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岂非圣人之遗化,好礼乐之国哉?……然后诸儒始得修其经艺,讲习大射乡饮之礼。叔孙通作汉礼仪,因为太常,诸生弟子共定者,咸为选首,于是喟然叹兴于学。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自是之后,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轅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于齐则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史记·儒林列传》)

汉朝立国,初有干戈,四海未定,未遑庠序之事,中有孝文帝好刑名之言,孝景帝不任儒,窦太后又好黄、老术,然而学术准备已足,儒学发展油然,六艺均有所传承流布,言《易》者有菑川田生;言《书》者有济南伏生;言《诗》有鲁申培公,齐人轅固生,燕人韩太傅;言《礼》则有鲁高堂生;言《春秋》有齐人胡毋生以及赵人董仲舒等。

汉初诸儒生勃然而兴,所言所行为儒学的复兴造了势。薛人叔孙通定朝仪,孝惠即位,徙通为奉常,定宗庙仪法。乃稍定汉诸仪法,皆通所论著也。^②虽然,太史公指摘叔孙通“颇有所增益减损,大抵皆袭秦故”^③,但是仍肯定“叔孙通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④。陆贾首开学术风气以诗书六经作为治国之本^⑤,《新语·道基》云:“《鹿

① 《汉书·食货志》。

② 《汉书·酈陆朱刘叔孙传》。

③ 《史记·礼书》。

④ 《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

⑤ 李威熊:《董仲舒与西汉学术》,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8,第25~29页。

鸣》以仁求其群，《关雎》以义鸣其雄。《春秋》以仁义贬绝，《诗》以仁义存亡。乾坤以仁和合，八卦以义相承，书以仁叙九族，君臣以义制忠，礼以仁尽节，乐以礼升降。”倡立儒道并行互用的学风，徐复观先生云：“陆贾所把握的是活的五经六艺，而其目的是解决现实上的问题，所以把儒家的仁义与道家的无为之教，结合在一起，开两汉儒道并行互用的学风。”^①贾谊以儒为本、融合道法，尝试建立一套儒家思想的新格局。他主张汉兴自当改制以顺天命，提倡礼法互致，“夫仁义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权势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以儒家礼乐仁义之术为本，来移风易俗，化治天下，“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向道”。^②

建元元年，汉武帝即位，“冬十月，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③。卫绾因病免相，窦婴继任，田蚡为太尉，“魏其、武安俱好儒术，推毂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迎鲁申公，欲设明堂”^④。《史记·儒林列传》云：“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向之，于是召方正贤良文学之士。”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赵绾坐请毋奏事太皇太后，及郎中令王臧皆下狱，自杀”。由于窦太后的介入，儒学之事宜暂告中断。建元五年，武帝置“五经”博士，博士所立以传统经学为鹄的，不再是“学通行修，博学多艺，晓古文、《尔雅》，能属文章者”，从此儒家经学垄断了上层学术。建元六年，窦太后崩，黄老之学、术的大树倒了，也就为儒学的发展廓清了障碍，“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⑤。黄老、刑名之学奄息，元光元年五月，汉武帝第二次召贤良文学之士，元光五年，武帝第三次召贤良文学之士，董仲舒《天人三策》于是出。

董仲舒，广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⑥“景、武之世，

①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卷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第62页。

② 同上。

③ 《汉书·武帝纪》。

④ 《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

⑤ 《史记·儒林列传》。

⑥ 《汉书·董仲舒传》。

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①《汉书·儒林传》云：“仲舒通五经。”元光五年，武帝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而仲舒以贤良对策焉。对策在史书中记载见《汉书·武帝纪》以及《汉书·董仲舒传》，前者的记载可视为对后者详细记述的缩略，《汉书·武帝纪》曰：“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业休德，上参尧、舜，下配三王。”上古唐、虞，周之成康世，“画像而民不犯”，刑错不用，德及鸟兽，四海归服，天降祥瑞，武帝之问意在于二：一是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业休德，上参尧、舜，下配三王？二是何施而能够得到上帝的眷顾，获得河洛出图书之天祥？何行何施归结一点即君上自己怎么做，此乃人为。

后者《汉书·董仲舒传》详载了三次策问，第一次策问，武帝问道：

夫五百年之间，守文之君，当涂之士，欲则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众，然犹不能反，日以仆灭，至后王而后止，岂其所持操或悖谬而失其统与？固天降命不可复反，必推之于大衰而后息与？乌乎！凡所为屑屑，夙兴夜寐，务法上古者，又将无补与？

三皇五帝改制作乐而天下和洽，至于后王桀、纣王道大坏，后来者效法五帝三王的很多，为什么都流于失败了呢？是人主之作为乖失了正道、大统，还是天命别有所属？究竟人务法于上古之努力能不能有所补益呢？分述之：（1）“三代受命，其符安在？”（2）“灾异之变，何缘而起？”（3）“性命之情，或夭或寿，或仁或鄙，习闻其号，未烛厥理。”（4）“何修何饬而膏露降，百谷登，德润四海，泽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灵，德泽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何修何饬？如何做才能受天之佑，享鬼神之灵，德泽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

要言之，汉武帝所问不外是涉及天、人之间的关系，即“天人相与之际”。不妨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解：一、天赋人的天命具体内容是什么？或者说，天之示警、祥瑞之兆因何而起？二、人如何做才能得到天命的眷顾，达到大治永治？从人性来说，施政的对象是人，人性如何是政令操作

^① 《汉书·五行志》。

的现实基础？

董仲舒对曰：（1）“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2）“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3）“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质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寿，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乱之所在，故不齐也”。（4）“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

董仲舒所对首先表明，“天命与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空谈天命以及人的性情难免蹈虚，不妨从历史典籍中窥得大道，而《春秋》之书，“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最足借鉴。“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国家施政若不合于道，天自然会降下灾异，首先确立了天的权威；而要合于道，得到天命的眷顾最根本却在人为，人君“强勉学习，则闻见博而知益明；强勉行道，则德日起而大有功”，树立了价值归宿以人为目的，将天与人之际初始融合了起来。

而问题的回答渐进之，简言之，武帝所不明的在于从大治到大乱，是不是道或天命改变了呢？背后的潜台词实质是不明白“道”是什么。董仲舒答道，道是适于治之路，仁义礼乐等社会法度是道的现实体现，礼乐的作用在于教化万民，变民风，化民俗，以达到天下洽治的目的。进一步，大道由完整至于微缺，陵夷至乎桀、纣时而大坏，是天命转移了吗？仲舒以为，天命有所转移是事实，而天命转移的符应也存在，如“白鱼入于王舟，有火复于王屋，流为乌”等，但是“治乱废兴在于己，非天降命不得可反”，天下之人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废德教而任刑罚。刑罚不中，则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恶畜于上。上下不和，则阴阳缪盪而妖孽生矣”。天的符应在于人的努力，不可推向天命，实质上将天命转化为人心的代名词，但是并没有取消其绝对权威、神圣性。顺次，“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道之所弘的对象落实到人，而所施的对象亦是人，人性、人情则是思考的重点了，仲舒以为，“天之令谓之命”“生之质谓之性”“人之欲谓之情”，命有夭、寿，“或夭或寿”，性有仁、鄙，“或

仁或鄙”，但都是“陶冶而成之”，均属后天陶冶和教化而成，而这都要归结到现实政治、社会生活的治乱，“尧、舜行德则民仁寿，桀、纣行暴则民鄙夭”。“声发于和而本于情，接于肌肤，臧于骨髓。故王道虽微缺，而管弦之声未衰也”，上古为治的礼乐的教化本于人情、人性，“王者功成作乐，乐其德也。乐者，所以变民风，化民俗也；其变民也易，其化人也著。”今之思治者，自然要本人性、人情之所在，“刑主杀而德主生”，要“任德教而不任刑”；以礼乐为模式，“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夫仁、谊、礼、知、信五常之道”，在上者能够修饬五者，自然受天之兆，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概括而言，武帝所问的“天与人相与之际”，仲舒归结为天命的转移取决于人间政治之好坏，人间政治的施为要以人性、人情为本，实质上将最终的本体推向了人为。

第二次策问是接第一次策问而来，武帝问：

1. 盖闻虞舜之时，游于岩廊之上，垂拱无为，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于日昃不暇食，而宇内亦治。夫帝王之道，岂不同条共贯与？何逸劳之殊也？盖俭者不造玄黄旌旗之饰。及至周室，设两观，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陈于庭，而颂声兴。夫帝王之道岂异指哉？

2. 今阴阳错缪，氛气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廉耻贸乱，贤不肖浑淆，未得其真，故详延特起之士，意庶几乎！今子大夫待诏百有余人，或道世务而未济，稽诸上古而不同，考之于今而难行，毋乃牵于文系而不得骋与？将所由异术，所闻殊方与？

两个问题分开来看，1之问题其意有二，虞舜时候是“垂拱无为”，周文王则是“至于日昃不暇食”，二者都达到了天下太平、宇内洽治，帝王之道应该是“同条共贯”，为何如此不同呢？言下之意是既然为治之道在于受天命、施人为，何种方式才是最佳的选择呢？二是，虞舜取无为之术能够至太平，汉兴几十年来黄老之术亦作为主导思想，然而阴阳错缪，氛气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言下之意在于求废黄老之理据和兴其他学说之理由。2之问题在于问，上位者夙兴夜寐、兢兢业业，“夙寤晨兴，惟

前帝王之宪”，“劝孝弟，崇有德”，“问勤劳，恤孤独，尽思极神”，效果却不明显，依旧不得大治，民众不得康安，原因究竟何在呢？言下之意在于实质上我已经取法儒家了，为什么还是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呢？

董仲舒对曰：道是所由适于治之路，虞舜之治与周文王之道并没有什么不同和改变，“帝王之条贯同”，且虞舜的垂拱无为并不是完全无为，尧受命后，“以天下为忧，而未以位为乐也，故诛逐乱臣，务求贤圣”，得到舜、禹、稷等以辅助，才能“教化大行，天下和洽，万民皆安仁乐谊，各得其宜，动作应礼，从容中道”。并不是如武帝所言“游于岩廊之上，垂拱无为”。周文王时，纣王逆天暴物，杀戮贤知，残贼百姓，是以“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顺天理物，师用贤圣才致天下太平。二者因时而取不同，均是有为之术，汉兴的黄老无为术至于今日难以维持，自然不能持之以久而至太平。“俭非圣人之中制也”，破无为就要倡有为之术，首先就要顺时承天命，“改正朔，易服色”，以应天。效法圣王为治之道就要兴礼乐、慎刑罚，“爵禄以养其德，刑罚以威其恶，故民晓于礼谊而耻犯其上”。“周公作礼乐以文之，至于成康之隆，囹圄空虚四十余年，此亦教化之渐而仁谊之流，非独伤肌肤之效也。”礼乐教化与刑罚的效用互补，二者缺一不可，秦朝“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憎帝王之道，以贪狼为俗”，只知刑罚而没有礼乐文教，是以“刑者甚众，死者相望，而奸不息”。其意在指向当时的政治态势，建元六年，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黄老刑名并称，董仲舒以为“黄老”与“刑名”本为一体，言下意即指汉初政策与暴秦并无二致，官吏暴虐百姓，与奸为市，贫穷孤弱，冤苦失职。形格势禁，政策必须改弦更张，必须崇尚礼乐仁义，而慎刑罚。

2 问的回答，董仲舒与其说是正面回应武帝的问题，不如说是阐述自己的理想施政主张。囿于情势，首先对武帝的兢兢业业予以肯定，“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内莫不率服，广览兼听，极群下之知，尽天下之美，至德昭然”，话锋一转，“功不加于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君子诚于中而形于外，要“因用所闻，设诚于内而致行之”，言行一致，切实去行。其次，人能弘道，弘道之人不限于君上，主上尽心力行德政，“未云获者，士素不厉也”，亦须有好的吏治贯彻实行，“今吏既亡教训于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官吏与主上之旨背道而驰，政令难以畅达，士大夫不能称其职，

必须养士用贤。养士之途,“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士是官吏的来源,郡守、县令是民之师帅,承担教化职责,若师帅不贤,则主德不宣,恩泽不流,必须“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当今举贤才、考吏治之方式也要变革,“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贤也”,仲舒“以为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考核要重视绩效,“毋以日月为功,实试贤能为上,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能够遍得天下的贤人,则“三王之盛易为,而尧、舜之名可及也”。

前两次董仲舒的答对虽然不废天的权威,但是侧重点转移到人的一面,而人为的重点更在于君主的切实践行,尤其是第二次的回应更凸显了礼乐仁义等社会法度的改弦更张的必要以及具体社会现实施政的应为方面。第三次武帝的发问也就表明了对此的疑惑。策三:

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故朕垂问乎天人之应,上嘉唐虞,下悼桀、纣,浸微浸灭浸明浸昌之道,虚心以改。今子大夫明于阴阳所以造化,习于先圣之道业,然而文采未极,岂惑乎当世之务哉?条贯靡竟,统纪未终,意朕之不明与?听若眩与?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谓久而不易者道也,意岂异哉?

“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武帝以为他所问关乎“天人之应”,而所答对“明于阴阳所以造化,习于先圣之道业,然而文采未极”,董仲舒的应对实质上将重点侧向了人与今,那么,如果言天不能够在人事上得以验证,言古不能够在现今寻找依据,将彼此割裂开来,言天、言古意义何在呢?其二,在一对、二对中,武帝一再追问“帝王之道,岂不同条共贯与?何逸劳之殊也?”,仲舒也先后表明,道是所由适于治之路,虞舜之治与周文王之道并没有什么不同和改变,武帝或许是对仲舒的点到为止不能全然了解,或许是对当时政治的施为以何为道、如何合道以及道究竟是何存有困惑,故而再次追问“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谓久而不易者道也,意岂异哉?”

对此两问，仲舒答道：

(1) 天之权威不可易，“天者群物之祖也”，它遍含万物，日月、阴阳、风雨、寒暑无不纳入其中，“圣人法天而立道，亦溥爱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设谊立礼以导之”。天与人相应，如“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爱也；夏者天之所以长也，德者君之所以养也”。

(2) 古之通谊不可废，“古者修教训之官，务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后，天下常亡一人之狱矣。今世废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弃行谊而死财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岁之狱以万千数。以此见古之不可不用也”。

(3) 以德化民、修教训之官，古代王者所为的凭据是本着人性、人情，而不是肆意而为。“天令之谓命，命非圣人不行；质朴之谓性，性非教化不成”，人贵于物，“人受命于天，固超然异于群生”，是故，“王者上谨于承天意，以顺命也；下务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人“超然异于群生”，崇仁义、重礼节、安处善、乐顺理是可以实施教化的前提。在这里，阐述王者上承天意以顺命，下务明教化民以成性，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表明了社会后天环境对于人性的影响以及社会秩序、政治法度产生、存在的必要性。但是也不自觉将教化的权力赋予了第三者，而无形中剥夺了自我成善的可能，为政治统治者滥用权力埋下了伏笔。

(4) 圣人以天承命、顺性以化民，此为万世不易之道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三王之道所祖不同，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虽为之不同，但都是“将以救溢扶衰，所遭之变然也”，道并未有实质的改变。“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顺势，仲舒提出“王者有改制之名，亡变道之实”，当今需要变革以承“道之时”也。“今汉继大乱之后，若宜少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正朔、服色要变，更重要的在于在大一统的形式下，改变“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的局面，使万方归于一统，文化秩序归于一正，“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

(5) 仲舒借此阐述自己的理想的政治秩序是一统，“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文化秩序是“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而合理的政治运作则是